

红色记忆

面对上千人的追杀，他与战友边打边撤，到离驻地还有三里的广洞岩时，遭遇埋伏。

土匪蒲自喜一刀砍掉其左臂，他单手仍将蒲按到身下……

卞洪运：长眠巴蜀的沂蒙赤子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胜男

去年8月,《三峡都市报》刊登的一篇名为《沂蒙山的儿子卞洪运,你在哪儿?》的报道引发关注,祖孙三代人走遍半个中国,苦苦寻亲60多年的故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卞洪运烈士的埋骨之地终于在重庆市万州区恒合乡烈士陵园找到了,卞洪运的牺牲迷团也随之解开。对该事件进行追踪报道的《三峡都市报》记者张龙平,11月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恒合乡烈士陵园正在重新规划建设中,卞洪运烈士的陵墓也即将迁往新址。

动荡童年 立志革命

卞洪运1922年出生于费县朱田镇李家庄村卞家庄,在那个社会动荡,国破家亡的年代,卞家人生活虽然艰苦,却也还算过得去。

1928年,山东巨匪刘黑七血洗费县大泗彦村,泗彦一个村被杀绝了13户,卞家庄不足50口人家的小村庄也被杀死了十几个人,年仅6岁的卞洪运跟随父母逃到东山才幸免于难。亲眼目睹了土匪、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卞洪运自幼心中便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十五六岁时便想参加八路军。

天宝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和妻子李炳爱结婚不久的卞洪运积极报名当上了民兵。革命意志坚定,加上曾上过两年夜校识几个字,年轻的卞洪运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民兵战士。

卞洪运的孙女卞荣梅告诉记者:“奶奶经常跟我们念叨,爷爷力气大,干活利落,榜地别人干一趟,他能干两趟。还说爷爷性子慢,不爱说话,爱笑,脾气好,他们结婚后从没红过脸。”

参加革命 盼望胜利

1944年9月,天宝山革命根据地征兵,卞洪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通父母和妻子的思想工作,应征入伍。临走时披红挂彩的他对妻子说:“不管我走到哪儿,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把你扔了。”

卞洪运被编入八路军鲁南军区三团,因作战英勇,荣立二等功,升任班长,排长。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卞洪运在上冶一次战斗中腹部和左手受伤。家人得知后派卞洪运的大哥去找,征得领导同意后就近回家养伤,这也是卞洪运离家4年后第一次回家。“在家没呆几天,国民党中央军就得到了消息,多次勾结土匪来抓我父亲,家人只好连夜把我父亲送到青龙山前亲戚家养伤。国民党没有抓到我父亲,把我大伯抓进还乡团充了丁。”卞洪运的儿子卞传德说。

中央军走后,卞洪运伤势稍稍好,就只身去攻部队,遗憾的是没能找到。他在家乡加入了费县由吾区工队,专打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后来,卞洪运在一次战斗中再次受伤,伤愈后调到县



卞云、卞洪运、车鸿儒、刘洪山、米兆代五烈士墓碑



20世纪80年代卞洪运烈士家属合影



卞洪运之妻李炳爱拍摄于2004年

里当通讯员,经常到朱田、平邑、费县送信,每次送信都是步行,因为卞洪运身材高大走路快,任务完成得好,担任的任务就重一些,有时回来住一晚,有时好几天家人都见不到他的面。

淮海战役爆发前夕,卞洪运加入鲁南军区支前司令部,奔赴淮海战场。临走时,他对母亲说:“娘,我过了年正月就能回来。”并怜爱地对怀孕6个月的妻子说:“正月回来我给你买红糖。”离家几个月后,卞洪运写来了一封信,询问妻子的情况,他牵挂着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1949年农历二月,儿子卞传德出生了,家里人赶紧给卞洪运写信告诉他这一喜讯。卞洪运立即写了回信,信中说:“我们夫妻二人年龄都这么大了,有了一个儿子,太好了。不久我就能回家,我们全家团圆,就给孩子起名叫‘盼’吧,盼望革命早日胜利,盼望全国人民早日解放,也盼望我们家乡早日团圆。”

1949年夏,李炳爱在信中对丈夫说:“儿子都好几个月了,你回来看看吧。”秋天,卞洪运来信说“部队要南下,地址不定,等安顿好再来信。”后来,家人收到一封信,据老人回忆,信中说“不养娘了”。因信中未提到妻儿,家人估计这封信不是卞的亲笔信,卞洪运此时很可能已经牺牲。从此,卞洪运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遍寻忠骨 亲人不弃

与卞洪运失去联络后,他的妻子、父母一直盼望着他的归来。看村里及附近村里和卞洪运一同去参军的人除4人牺牲外全都陆续回来了,唯独卞洪运一直没有音讯,李炳爱心急如焚,一次次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迈着小脚步行50多里的山路去费县民政局查找卞洪运的下落,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当时有的人对李炳爱说:“卞洪运当了大官不要你们母子了。”“卞洪运到台湾去了。”但李炳爱深知自己的丈夫,她相信丈夫离家时的话,更记得丈夫临走时对尚在腹中的孩子的牵挂。她不想

到那不幸的字眼,只是苦苦盼望等待,期待卞洪运能像上一次一样突然回来,哪怕残废了也好。

1950年,县民政局下发烈士证明,说卞洪运已在徐州攻坚战中牺牲。“奶奶当时只有24岁,她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但为了年幼的父亲又坚强地回到了家,从此她终生没有再嫁,一面含辛茹苦地抚养父亲长大,一面四处打听,寻找爷爷的遗骨。因为没有文化,写信要找别人代写,有一次奶奶拿着爷爷所有的信件资料找人写信,谁知第二天再去时,写信的老先生竟连人带信一起失踪,留有爷爷部队番号等宝贵资料的信息一无所剩,留下的只有口传的一些信息,寻找爷爷遗骨的难度可想而知。”卞洪运的长孙卞荣梅说。

但是,李炳爱一直没放弃寻找。后来,儿子卞传德长大成人曾多次到徐州、济宁、枣庄、兖州等地寻找,又托人到广东福建等地寻找,均无消息。卞传德的女儿长大后,又多次到徐州、南京等地寻找都没有音讯。皇天不负苦心人,2010年7月,卞洪运的孙女卞荣梅偶然在网上找到了有关爷爷卞洪运的线索。

单臂斗匪 遗恨他乡

卞荣梅说,为了寻找爷爷遗骨的线索,他们兄妹经常在网上搜索爷爷卞洪运的名字。去年7月底,她忽然发现爷爷的名字出现在重庆市万州区官方网站“唱读讲传”活动中的《凤仪暴乱始末》一文中。

原来,1949年6月,卞洪运经层层选拔加入西南服务团三支队,7-9月在南京市集训,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即随西南服务团三支队离开南京进军西南,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历时70多天,行程3500余公里,于12月抵达万县,任凤仪征粮队队长兼指导员,相当于凤仪首任武装部部长。

凤仪乡位于万县东南边陲,与湖北利川接壤,山高路陡,林深树密,人烟稀少,是土匪匿身的好地方。解放前,凤仪暴乱匪首王冠南权倾当

地。1950年4月15日,解放军侦察员伍代江等4人会同卞洪运、米兆代、卓云等解放军征粮队员去张石岩,准备抓捕王冠南。但王冠南已有准备,卞洪运、伍代江刚上地坝坎,侦察员陈建国、何凯就被匪徒从窗洞中伸出的步枪打中。卞洪运等立即疏散还击,陈盛德边还击边撤退,至喻家弯时被击中,卓云、何芳桥被俘,米兆代于土庙子被击杀,卞洪运被迫至干坝子广洞桥上遭土匪蒲自喜埋伏并杀害。历时半年的凤仪反革命暴乱由此开始。

“当地的很多村民都知道爷爷牺牲时的故事,他们说,当时爷爷他们几个人面对的是上千名土匪、国民党残兵及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他们撤退时敌人早已控制了各个路口。爷爷边打边撤到离驻地还有三里的广洞岩时,遭到了屠夫出身的土匪蒲自喜的伏击,被蒲一刀砍掉了左臂。爷爷单手持刀勇斗匪徒,仍把蒲按到山下,蒲从背后抽出一把尖刀朝爷爷胸部猛刺,爷爷不幸壮烈牺牲,当时只有28岁。”卞荣梅说。

匪徒们把卞洪运的尸骨掀下河滩。当晚,天降大雨,山洪爆发,他的尸体被冲出好几里,后被赶来剿匪的战友李占中等发现,含泪安排当地百姓草草安葬。

在重庆当地政府以及多家媒体的帮助下,卞洪运的身份最终得到证实。2010年8月26日,卞传德在子女的陪同下,在重庆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祭拜了父亲的陵墓,并寻遍了他生活、战斗、牺牲的地方,圆了祖孙三代60多年的寻亲梦。

卞荣梅说:“奶奶知道爷爷的墓地找到后,60多年一直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她觉得爷爷把自己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干的是大事,虽然对家庭亏欠太多,但她已经替爷爷赡养父母、抚养儿子,支撑起这个家。奶奶虽然在2008年因脑溢血瘫痪在床,但现在的心情好了许多,她终于可以向爷爷诉说这些年的思念……”卞荣梅说出已经87岁的奶奶最后的心愿:寻找健在的山东籍西南服务团老干部,查找西南服务团最原始的档案,在她在世时知道更多关于丈夫的事迹。

1940年10月11日凌晨,上海虹口祥瑞路上的傅公馆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此时,仆人老朱正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蹑手蹑脚地走着,不时警觉地观望着四周。老朱来到一间卧室门口,轻轻地推门进去,床上的人正在安然熟睡。就在这个时候,老朱从怀里抽出了一把菜刀,只见一道寒光闪过,老朱高举手中的菜刀,猛然朝着床上熟睡的人狠狠地砍去。

被菜刀砍杀的人时任上海伪市长的傅筱庵。

□傅筱庵生于1872年,浙江省镇海县人,15岁时进入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做工,因精通英语,善于逢迎,短短3年就被提升为领班,经管工人劳资等事宜。当时,厂里的工人大多居住在船厂附近,而这些房产都归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理严信厚所有。

严信厚是中国近代工商界的著名人士,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对船厂附近的房产,严家每月派人收租,但工人们收入甚微,生活贫苦,很多人都交不出房租,严家为此十分头痛。傅筱庵得知此事,认为包袱的时候到了,便毛遂自荐,由他出面代收房租。

实际上傅筱庵买通了船厂的洋大班,把房租从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中扣下,然后由他送到严家。由此,傅筱庵博得了严家的好感,又趁机认了严信厚的爱妾杨氏为“干娘”。

“干娘”杨氏与盛宣怀夫人常有往来,傅筱庵因此也成了盛家的座上客。盛宣怀,字杏荪,江苏省武进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晚清首富,也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奠基人之一。

1911年,刚刚担任晚清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以铁路“收回国债”的名义向英、法、美、德四国列强筹借外债,激起了川、湘等省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并很快演变为一场武装起义。清政府只好下旨将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举家逃往日本避难,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人士认为盛宣怀畏罪潜逃,纷纷提出应将盛家财产充公赔偿。在商界人士集会时,傅筱庵当众叩头哀求免于没收盛家财产,自称是盛的代理人,暂为管理盛氏产业和盛氏各企业的股权。

1916年,盛宣怀病死于上海,他一生中所得到的财富竟达白银6000万两。傅筱庵就使用蚕食方法,把盛家财产攫为己有,因此积累了成千上万的财产,并在镇海老家和上海都拥有了大量地产。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傅筱庵已在上海的各大银行、企业、商会担任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职务,其中包括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招商局董事、总商会会长、宁商总会会长等等。但在几十个职务中,唯独缺少的是总商会会长一职。1924年,傅筱庵与大银行家宋汉章争选会长,两人相持不下,形成僵局。

最终,傅筱庵没能当选,但1926年,上海总

商会改选第八届会长的时候,傅筱庵终于在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提携下,当选为总商会会长,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那么,傅筱庵又是如何与大军阀孙传芳扯上关系的呢?

在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以及周边的很多地区都还在孙传芳的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枯竭,只能依赖银行贷款来维持残局,而政府的信用早已动摇,别家银行都不敢放贷,此时,唯有傅筱庵总是抢先一步,并且有求必应,利用金钱与之勾结。

□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上海,傅筱庵极尽两面派之能事,一方面遣人对北伐军的到来表示欢迎,一方面又亲往送别孙传芳逃离上海。傅筱庵自以为做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却不料已给自己树下了蒋介石这个足以取他性命的敌手。

蒋介石到上海后不久,即宣布上海总商会第八届会长选举无效,并以支持孙传芳的罪名对傅筱庵下达了通缉令。傅筱庵得知自己被通缉后,秘密向日本大使馆求援,由大使馆派武装卫队护送他上了外国轮船,逃往大连。

傅筱庵避居在大连,心却在上海,毕竟他的全部产业都在上海。他四处奔走,希望早日撤销对他的通缉令。由于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头面人物的多方疏通,加上蒋介石也需要傅筱庵在上海商界的影响力来支撑局面,1931年,国民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他回到了上海,但却没有了往日的威风。1935年初,上海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工商业倒闭风潮,通商银行遭遇民众挤兑,傅筱庵无力应对,青帮大亨杜月笙出面相助,国民党也趁机参股其中,傅筱庵则成了通商银行的一个虚名董事。

傅筱庵自从被剥夺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操纵大权之后,终日郁郁寡欢,但却野不死。他时常在家宴请社会各界名流,希望从中找到翻身的机会。跟傅筱庵往来的也大多是绅商闻人和北洋军阀的旧官僚,这些人都鼓动他卷土重来,其中最起劲的当数周文瑞。

周文瑞是盛宣怀的孙婿,在台湾银行做买办,和日本人常有往来,是一个日本通。此时正值1938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正在物色有望望的人物来接替苏锡文担任伪上海市市长,周文瑞就向他竭力推荐了傅筱庵,松井听说傅筱庵是盛宣怀的心腹总管,又当过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和总商会会长,一拍即合,立即派员到傅家数度联系。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接印上任,原先由日



傅筱庵



傅筱庵故居

本人组建,苏锡文担任市长和督察的“上海市大道政府”正式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办公地点也从浦东搬回了江湾的原址。

□正当傅筱庵自觉风光无限的时候,在他的老家镇海,却有万余民众上街集会,声讨他的汉奸行为。次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民众再次集会声讨,他在镇海的旧居大门也被人捣毁,这让

傅筱庵始料未及,也让他尝到了当卖国汉奸的苦头。然而,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此后,麻烦事情接踵而至。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好处倒是没有捞着多少,反而要自掏腰包维持局面。

因为市府开支一事,傅筱庵更是不惜得罪了梁鸿志,又为自己树下了一个大敌。梁鸿志,近代官僚、汉奸,1938年,在日本人的操控下,于南京成立维新政府。

梁鸿志要求傅筱庵去南京作名义上的“述职”拜谒,同时要向上海市征收一些税款。谁知,傅筱庵反而以上海政府开支庞大为理由,要南京政府每月给他二十万,否则他决不到南京。梁鸿志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勉强答应,傅筱庵这才到南京去拜谒了一次。

傅筱庵一路处心积虑、投机取巧的所作所为,早已给他埋下了不少隐患,尤其是在他当上伪市长之后,接连而来的暗杀与恐吓更是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介石责令戴笠组织行动,刺杀汪精卫,戴笠派出军统局的书记长到上海,策划刺汪行动。这原本和傅筱庵并没有直接关系,傅筱庵之所以与这件事情有牵扯,是因为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一个经理。

这个人叫许天民,他和戴笠派出的军统局书记长是至交,又和傅筱庵素有深交,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刺汪行动,他们决定拉拢傅筱庵,希望他可以利用伪市长的身份,在汪精卫来沪时设宴款待,并在宴席中由军统人员伺机对汪精卫下手。

傅筱庵欣然答应,并发出豪言壮语,誓帮军统顺利完成刺杀计划。有了傅筱庵信誓旦旦的表态,军统方面就只管坐等行动时机的到来。然而,戴笠万万没有料到,传来的竟然是许天民等人先后入狱的消息。原来,傅筱庵两面三刀的做派又故伎重演,表面上答应许天民协助刺汪,背地里却将刺汪计划向汪伪特工全盘托出。蒋介石怒不可遏,誓将傅筱庵之间的新仇旧怨一并算清,遂下令除掉傅筱庵。

但几次刺杀行动都失败了。

接连遭遇刺杀,傅筱庵被吓得不敢,于是有了挂冠求去之意。然而,他这个人偏偏很迷信,有个算命先生替他排了八字,看了面相,说他是人品大官的命,此后还有十年大运,他相信了。为了算命先生的这一句话,傅筱庵打消了去意,继续心安理得地做他的汉奸伪市长。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撰稿人稿

相关链接

凤仪暴乱中牺牲的山东南下干部

□ 陈巨慧 刘程程 整理

在重庆万州区恒合乡烈士陵园中,与卞洪运烈士墓并排的还有山东南下干部,中共万县龙驹区委组织科长车鸿儒及凤仪征粮队队员米兆代、卓云、刘洪山四位烈士的墓,他们也都是山东人。曾跟随车鸿儒在凤仪征粮队工作的退休教师邹兴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凤仪暴乱始末》、《细微未处见真情——忆车鸿儒同志》等文章,详细回忆了车鸿儒等烈士的英勇事迹。

车鸿儒,山东博兴县人,1926年出生于贫农家庭,抗日战争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年进军西南后,12月上旬被派任中共万县龙驹区委组织科长,旋即率征粮队到凤仪工作。

在邹兴文印象中,车鸿儒勤奋刻苦,虚心好学、工作踏实,实事求是。他既抓重点,又能点面结合。每到工作汇报时,总是刨根问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公粮负担问题上,他认真细致,对发出的征粮通知单逐户检查;除求公平外,也兼顾负担能力,即使对地主也一视同仁,使当年凤仪的征粮工作一直名列万县前茅。

暴乱前夜开会完后,夜已深了,车鸿儒显得有些疲惫。邹兴文他们开玩笑说:“车科长,你想家吗?想老婆吗?”车鸿儒深思了一会儿,跑到楼上寝室内拿来一根长约两三丈长的洁白的捆背包线绳,深情地说:“我也是人,怎么不想家,我离家已两年多了,母亲已年老,弟弟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斗争,生死不明,我结婚已多年,但和妻子相会的日子不多,至今仍无子女,这根绳子就是我南下时临走的晚上妻子连夜为我赶织的,多贤淑的妻子啊!我经常想到妈妈和家中人,恨不得马上回家,但一想到全国仍未完全解放,劳动人民还在受苦,也想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家人团聚的梦,只能待以后圆了……”他泪花闪烁,显得更加憔悴和疲惫。

次日凌晨,车鸿儒很早就吃了早饭,准备按照昨夜会上的决定去小龙盘。反革命暴乱枪响后,他提着上膛的短枪准备冲出迎敌时,忽然大叫一声:“唉呀,我的文件包。”当即返回楼上取走文件包再次冲出。为了严守国家机密,他错过了组织同志们武装对抗和适时冲出的大好时机,而被逼翻越后院墙去了街民李元松宅后一孤楼去。

仅有一支短枪,13发子弹的车鸿儒沉着镇静地从窗孔中射出一枪,匪中队队长李少青被当场击毙。枪响引来了众匪徒,他同匪徒对射,匪徒虽以火枪、步枪、手枪、手榴弹、土火炮转攻,打得屋瓦粉碎,墙壁上弹痕累累,但不敢近前。匪徒们高喊“缴枪不杀”,他却大骂:“车老子有枪一支,有本事的上楼来拿。”

无可奈何之下,匪徒们从街民家掠来几床棉絮,顶在头上去孤楼底层,用步枪、手枪向上射去。但因木板太厚,射程太近加速不够,未能打穿楼板,没有伤及车鸿儒。匪徒们又准备用粮油引火烧楼,但因街民哀求劝住了整个场镇而未实施。

车鸿儒与匪徒已对峙6小时。正当匪徒无计可施之时,王冠南、蒲柏衡、蒲汉卿等匪首坐着滑杆来了,他们命令“大刀会”在李元松堂屋内坐着熏香熏烛敬了“师爷”,喝了“神水”后,一起涌向孤楼唯一的门口。匪徒金英刚首先破门而入,一梭标刺中车鸿儒的胸膛,众匪徒跟着轮番穿刺,车鸿儒在弹尽援绝后,身负31孔壮烈牺牲在匪徒的屠刀下。

□1940年10月10日晚上,傅筱庵从外面应酬归来,满身酒气,酩酊大醉,仆从将他扶入屋内,他倒头便睡,鼾声大作。11日凌晨,傅筱庵仍沉浸在熟睡之中,突然,一把锋利的菜刀落了下来,在他的脖子上连砍数刀。几小时之前还八面威风的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刺杀傅筱庵的竟是家里的仆人,厨师老朱。

有一种说法是,傅筱庵避居大连时,在一个寒流肆虐、北风大作的冬日,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溘倒在他家门前,于寒风之中瑟瑟发抖。出于一时的惻隐之心,傅筱庵将这名男子救回家中,因听说他会烧一手地道的宁波菜,不禁心中为之一动。客居北方,如能吃上家乡的饭菜,也算是慰藉了傅筱庵思乡的情绪,于是便将他收留下来做了家中的厨师。这名男子就是老朱。

傅筱庵出任伪市长期间,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日方人员进行招待联络,迎新送旧。为了讨日本人的欢心,傅筱庵常在家中大摆筵席,同时提供色情对象,对这一套工作,他是做得八面玲珑,有声有色。然而,老朱是山东人,为人爽直而有烈性,早年曾在日本人的工厂当过童工,饱受日本人的欺压,对日本人深痛恶绝。自从傅筱庵当上了汉奸市长,他不仅要给日本人烧菜摆宴,还看尽了日本人挟着淫娃荡妇作乐的乐趣,心里早已不是滋味。

当然,老朱刺杀傅筱庵是事先被军统策反的,是军统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暗杀行动。

为了能够成功策反老朱,军统人员确实颇费了一番周章。将老朱定为内线的人选之后,军统对他又进行了更细的了解,发现老朱嗜酒,闲来无事总要到酒馆喝上两口。于是,一个名叫游柱的军统人员便在傅筱庵的住宅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看见老朱果然到酒馆喝酒,便想方设法和他拉近关系。游柱常听老朱抱怨傅筱庵府中的日本人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而自己一出门,又因为是为汉奸家的帮佣到处受人冷眼。听了这些话,游柱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启发他的民族觉悟,向他灌输汉奸该杀的思想。直到有一天,机会成熟,游柱向老朱提出了刺杀傅筱庵的计划。

事实上,老朱对傅筱庵的落水投敌早有积怨,军统提出暗杀任务后,晓以民族大义,另外,还许下了金钱上的奖励,并确保他在暗杀成功之后能够安全转移,老朱由此便同意了。10月11日清晨,老朱砍杀傅筱庵之后若无其事地退出卧室,将房门掩好,和往常一样拎着菜篮子出门采购,还不忘和门口的警卫打一番招呼,就这样,老朱镇定自若地离开公馆,全身而退了。

事后,军统先把老朱安排在浦东藏身,怕汪伪特工报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到了重庆,军统给了他5万元奖励,让他开了手工卷烟厂,以此为生。

伪市长无声无息地被杀,尸体直到日上三竿才被人发现。严密守备之下,凶手竟能来去自如,逃之夭夭,这对日本军部来说无疑是一个不解之谜。日本军部在傅筱庵的官邸附近大肆搜查,却没有任何结果。

